

# 马亚一家

上

〔葡萄牙〕埃萨·德·凯依洛斯



# 马亚一家

上

〔葡萄牙〕埃萨·德·凯依洛斯 著

任吉生 张宝生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北京



# 马亚一家

下

[葡萄牙]埃萨·德·凯依洛斯 著

任吉生 张宝生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北京



JOSÉ MARIA DE EÇA DE QUEIROZ  
OS MAIAS

---

EDIÇÃO «LIVROS DO BRASIL»

LISBOA

DE ACORDO COM A PRIMEIRA EDIÇÃO (1888)

马亚一家(共两册)

Maya Yi Jia

---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548,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24\frac{7}{16}$  插页 4

1988年7月北京第1版 1988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7,560

---

ISBN 7-02-000339-7/I·340

书号 10019·4267 定价 6.10 元

## 前 言

十九世纪下半叶，是现实主义小说在欧洲产生出丰硕成果的时代。法国的巴尔扎克和福楼拜，英国的狄更斯和萨克雷，俄国的果戈理和托尔斯泰，西班牙的佩雷斯·加尔多斯和克拉林，都以他们真实地描写了社会生活、细致地刻划了人物形象的许多作品而留名于文学史。在葡萄牙，则于稍后的时期也出现了足以与这些现实主义大师们齐名的小说家若泽·马里亚·埃萨·德·凯依洛斯。

若泽·马里亚·埃萨·德·凯依洛斯于一八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生在葡萄牙西北部波尔图市附近的一个渔港波武阿·德·瓦尔津。他是当地镇长的私生子，从小寄养在祖父母家里。十岁时，被送到波尔图市上中学。一八六一年，到了科英布拉，进入科英布拉大学法律系的预备班，开始了当时流行于校园内的无拘无束的学生生活。他阅读各种各样的书籍，参加无穷无尽的辩论，因而接触到文化阶层中正在崛起的新思潮。这就是一八六五年发生的历史上叫做“科英布拉问题”的文学论争。青年诗人安特罗·德·肯塔尔（1842—1891）和特奥菲洛·布拉加（1843—1924）两人撰文抨击老诗人安托尼奥·费利西亚诺·德·卡斯蒂略（1800—1875）的保守观点，提出文学应该反映现实以促进改革现实的主张。这一次论争，虽然对埃萨·德·凯依洛斯印象深刻，但是还没有达到使他明确表示服膺这种主张的程度。

三十一岁时，埃萨·德·凯依洛斯从科英布拉大学法律系毕业，来到了首都里斯本。清闲的律师业务，激起了他从事文学创作的愿望；他开始写的几个短篇小说，竟然被《葡萄牙日报》采用发表，于是他继续写了起来。这些短篇小说后来汇编为《野蛮的散文》(1903)出版，它们有的情节曲折离奇，有的充满鬼怪幽灵，采用这样的书名，表示了作者对早期作品自我否定的态度。然而正是从这些“野蛮的散文”中，锻炼出了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家。埃萨·德·凯依洛斯幽默、讥诮的文风，周密、细致的描写，就是在这些短篇小说的写作中打下基础的。

一八六七年底，在“科英布拉问题”中已经崭露头角的肯塔尔和布拉加，也来到里斯本，与里斯本的青年作家阿维利奥·马努埃尔·德·格拉·戎克罗(1850—1923)、若泽·若阿金·塞萨里奥·维尔德(1855—1885)等人经常聚会，讨论当前的文学、哲学、政治、社会等各方面的问题，鼓吹改革和进步，逐渐形成了一个青年知识分子的集团，后来被称为“七〇年的一代”。埃萨·德·凯依洛斯参加了这个集团的活动，也在这些活动中逐渐形成了他的现实主义文学观点。“七〇年的一代”的活动的高潮，是一八七一年举办的“里斯本俱乐部民主讨论会”。在有一次讨论会上，埃萨·德·凯依洛斯作了演讲，公开宣布了自己的文学观点；他把现实主义称为“新的文学艺术的表现方式”；他主张文学必需勇于揭露社会的黑暗和罪恶；他谴责当代葡萄牙文学缺乏生机，缺乏创造性，庸俗而且虚伪；他呼吁积极提倡新的文学，也就是现实主义的文学，以促进葡萄牙社会的变革。

但是不久，“里斯本俱乐部民主讨论会”由于其激进的火药味而被政府当局禁止。这时候，埃萨·德·凯依洛斯已经进入外交部工作，一八七〇年曾被派往巴西。讨论会被禁以后，他与

友人文学评论家若泽·杜阿尔特·拉马略·奥尔蒂冈（1836—1915）合作，创办了《刺棒》月刊，以讽刺、幽默的内容评论葡萄牙的现实问题。可惜他和奥尔蒂冈的合作仅仅维持了一年：一八七二年，他被派往古巴担任驻哈瓦那的领事。他虽然离开了祖国，而祖国仍然在他心中，因为他带走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阿马罗神父的罪行》的构思。

《阿马罗神父的罪行》于一八七五年开始在《西方杂志》连载发表，一八七六年在里斯本出版单行本。这部小说，是葡萄牙现实主义文学的重大成就；它以犀利的笔锋揭露了葡萄牙保守势力的精神支柱：教会的腐化堕落，宗教信仰的愚昧，以及宗教教育对人性发展的危害。对于葡萄牙的保守势力，不啻是一个严重打击。

十九世纪末叶欧洲最不发达的国家，也许就是葡萄牙。它的农业生产十分落后，大工业几乎并不存在；全国大部分人口居住在封建的农村，文化不普及，绝大部分人目不识丁。即使在首都里斯本，能读能写的人也不满全市人口的一半。只有上层社会的人才谈得上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尽管如此，法国大革命后席卷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浪潮和封建势力的复辟活动，也波及到了封闭落后的葡萄牙。拿破仑侵略结束后发生的佩德罗和米盖尔兄弟之间的王位之争，进行了几乎十年，后来演变为立宪派和专制派之间的斗争，又经过了十年，才以立宪派获得胜利而告终。一八五三年，佩德罗五世继位，政局逐渐稳定。一八六一年，佩德罗五世去世，其弟路易斯继位。一八五一年立宪派掌权以来实施的一系列促进生产、发展交通的措施，对于民族经济的增长尽管收效甚微，仅仅为英国资本的进入开了方便之门，但是却相对地维持了十余年安定的政治局面。后来立宪派本身分裂成为两

派：历史派（主张激进）和更新派（保持温和），仿效英国两党的榜样，轮流执政，迫使为了争取宪政而一度活跃起来的激进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退出政治舞台。

到了六十年代，人们对宪政逐渐丧失信心，不满情绪弥漫于知识阶层。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在校园里、在咖啡馆里聚会，无休无止地争辩、讨论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孔德的实证主义，达尔文的进化论等等。在文学方面，他们崇尚法国福楼拜和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左拉的自然主义。一八六五年发生的“科英布拉问题”，表面上表现为激进的现实主义文学反对保守的浪漫主义文学的斗争，但是从当时肯塔尔发表的小册子《良好的判断和健康的趣味》和布拉加发表的小册子《文学的神权统治》来看，其中已经包含着对日趋反动的君主立宪政治的尖锐抨击。

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这批青年知识分子形成“七〇年的一代”的集体的时候，他们的活动已经与欧洲的政治运动和社会改革的浪潮合上了节拍。他们支持意大利的统一运动；他们支持西班牙罢黜伊萨贝尔二世；他们支持法国对普鲁士的战争；他们支持巴黎公社。在国内，他们参与了里斯本的“一月事件”；群众聚集街头举行示威，抗议政府新颁布的税则；他们举办了“里斯本俱乐部民主讨论会”，对文化、经济、政治的停滞落后状况进行尖锐的批评。巴黎公社的失败，使欧洲反动势力的气焰大为嚣张；葡萄牙立宪政府也开始了对“七〇年的一代”的活动的镇压。葡萄牙的进步思想运动落入了低潮。

埃萨·德·凯依洛斯的《阿马罗神父的罪行》，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前发表的。它为葡萄牙的现实主义文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葡萄牙文学的现实主义倾向，实际上已经在六十年代若安·德·德乌斯（1830—1896）的诗歌和朱利奥·迪尼斯

(1839—1871)的小说中出现。法国作家福楼拜对小资产阶级的批判，左拉对社会病态的剖析，对葡萄牙作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葡萄牙作家要求文学不仅具备艺术价值，而且还要具备明显的社会价值，于是文学作品几乎成了反映社会问题的文献。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了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

但是埃萨·德·凯依洛斯自从一八七二年投身外交工作，出任驻古巴哈瓦那的领事以后，就不再有回到国内长期生活的机会。一八七四年，他调任英国泰恩河畔的纽卡斯尔的领事；四年之后，又调往布里斯托尔。一八八八年，他又调往法国巴黎，实现了他多年向往巴黎文化生活的愿望；一九〇〇年病死于任所，终年四十五岁。在侨居国外的二十余年里，埃萨·德·凯依洛斯勤奋写作，之后又发表了长篇小说《堂兄巴西利奥》(1878)，《满洲官员》(1880)，《遗物》(1887)，《马亚一家》(1888)，《豪门拉米雷斯》(1900)，遗著《城与山》(1901)，以及游记、散文、随笔等大量作品。这些作品的绝大部分题材，仍然取自他祖国的生活。

《马亚一家》就是如此。它是在英国写成，一八八八年第一次在波尔图出版；内容写的是葡萄牙一个古老贵族马亚一家的没落，以及年轻一代知识分子对待生活的态度，从而反映出十九世纪末葡萄牙上层社会的保守凝滞和缺乏生机的状态。

小说的情节开始于一八七五年。这一年，是巴黎公社被镇压以后的第五年，也是“七〇年的一代”所掀起的进步思想运动遭到挫折的第五年。葡萄牙社会又恢复了惯常的安详的生活节奏。马亚家族的唯一后嗣，卡洛斯·达·马亚，从科英布拉大学学成回来，老祖父阿丰苏为此决定离开索居多年的乡下，搬回里斯本，并且把旧宅葵花大院修葺一新，迎接孙子。

马亚家族已经日趋没落，靠着变卖祖产维持局面。因此，老

祖父把卡洛斯看成是振兴家业的希望。老祖父自己年轻时曾经是个雅各宾派的激进分子，为了反对帝制流亡过英国，他是争取自由的一代的代表。但是他的儿子彼得罗，也就是卡洛斯的父亲，却受到浪漫主义思潮的侵袭，落得了一个自杀身死的悲惨结局。现在就看卡洛斯这个新生的一代的代表了。

一八七一年至一八七五年，正是卡洛斯在科英布拉大学学习医学的年代。这个“七〇年的一代”的代表人物，虽然在学校里接触到先进思想，参加过激烈的论战，但是一旦完成学业，回到里斯本，却并没有真正怀着救死扶伤，钻研科学的精神；他花了一大笔钱，设置了一个漂亮的诊所，却从来没有给一个病人治过病。他的好朋友若昂·埃夏也同样：这个自命为靡非斯特的青年诗人，也没有魔鬼那样的叛逆性格，尽管他经常以激烈忿懑的态度立身处世，尽管他十分崇拜巴尔扎克，他所引以自豪的杰作却是充满空洞幻想的长诗《一个原子的回忆》。

卡洛斯在里斯本无所事事，日夜出入社交场中，于是他先是做了勾瓦林纽夫人的情人，后来又爱上了玛丽亚·埃杜亚达而抛弃了前者。但是他和玛丽亚·埃杜亚达都不知道他们的关系后面隐藏着一个乱伦的悲剧：原来他们竟然是姊弟。这个家族的隐私，被一个接受了玛丽亚·埃杜亚达的母亲遗物的人所揭露：玛丽亚·埃杜亚达的母亲是带着女儿跟一个意大利王子私奔而死在国外的，遗言要求马亚家族承认这个孙女儿。卡洛斯在祖父阿丰苏的抚养教育下，对这个家庭悲剧一无所知。同样，玛丽亚随着母亲在欧洲流浪，长大后成为一个巴西商人的情妇而对自己的身世毫不了解。家庭隐私和恋爱悲剧的暴露，促成了阿丰苏的死亡。但是两个当事人却没有激起感情和道德的狂风暴雨，造成希腊悲剧那样的结局，而是在埃夏和管家的精心安排

下，平静地得到了解决：玛丽亚·埃杜亚达拿到一笔钱，移居巴黎，终于嫁了人；而卡洛斯则在埃戛陪同下，远航大西洋，去了美国，再周游世界。

小说的最后一章，写的是十年以后，也就是一八八七年初，卡洛斯回到祖国，和他的朋友们再度相聚，还去空关着的葵花大院怀旧。他发现葡萄牙依然如故，既没有发展，也不见衰败，只是人都老了，有的发了胖，有的谢了顶，其他“一切都没变。还是那样懒洋洋的卫兵围着卡蒙斯那尊忧郁的塑像转来转去。两座教堂的门上仍旧挂着教会纹章的红色门帘……一个角落里，有一群衣衫褴褛的二流子站在那里抽烟；对面的一个角落里，在‘哈瓦那之家’附近站着另一群抽烟的二流子，但他们穿的是长礼服，在谈论政治”。而卡洛斯自己，这个曾经一度是马亚家族希望所寄的青年，却成了一个侨居国外的寓公，一个一辈子“过着舒适生活的富人”，只有巴黎，才是地球上唯一适合他居住的地方。

《马亚一家》这部小说，其杰出的成就，就在于反映出了葡萄牙社会的这种惰性。小说里面没有曲折复杂的情节，人物的塑造也用的是白描手法，没有剧烈的内心冲突，也没有深刻的心理分析，然而这种被人们称作十九世纪后半叶葡萄牙人的世纪病的惰性，却从大量日常生活的细致描写中随处透露于纸面。卡洛斯一八七五年秋毕业后从欧洲旅游归来，到一八七七年又离家前往伦敦去横渡大西洋，其间在葵花大院旧宅的两年生活，他来往的朋友，他追求的爱情，以及以马亚家族为中心的许多不同性格，不同社会地位的男男女女，构成了这部小说描绘出的一幅社会世态的画卷。

埃萨·德·凯依洛斯的现实主义，在后来葡萄牙作家的文学创作中得到了坚持和发挥。葡萄牙社会变革进程缓慢，到一九

一〇年才推翻帝制，建立共和，使劳尔·布兰当(1867—1930)、阿基利诺·戈梅斯·里培罗(1885—1963)、若泽·马里亚·费雷拉·德·卡斯特罗(1898—1974)这样的小说家转而从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生活中汲取题材，使葡萄牙的现实主义文学达到了新的水平。

王 三 槐

1987年7月

一八七五年秋，马亚一家搬到里斯本居住。马亚家的那幢房子，在圣弗朗西斯科·德·保拉街的邻里之间和整个詹·维德斯区一带，被人们称为“葵花公馆”或干脆叫做“葵花大院”。虽说这座乡村式的院宅得了这么个雅号，但就凭它那灰溜溜的院墙，二层楼上那排带铁栏杆的窄凉台，和屋檐下一扇扇并排的小窗户，葵花大院看上去真象座凄凉的修道院，属于堂娜玛丽娅一世<sup>①</sup>时期盛行的建筑，只是屋顶上那只小钟和十字架使它有点儿象个耶稣会的房子。葵花大院是因为墙头那块方瓷砖上的图案而得名。那是一大束用带子系着的向日葵，带子上的字母和日期仍依稀可辨。嵌瓷砖的地方本来是应该挂刻着纹章的铜牌的，但是从来没挂过。

葵花大院已多年无人居住。一楼小门的铁栏杆上布满了蜘蛛网，这地方看上去已经成了废墟。一八五八年教廷大使布加林尼阁下来看过这处院宅，想在这里设立教廷使馆。这座建筑物浓重的宗教色彩和它幽静的环境吸引了他。他也很喜欢楼内那宫殿式的设计，那方格天花板和绘有彩画的四壁，画面上的玫瑰花环和小爱神们的脸都褪了颜色。但是，大使阁下过惯了罗马教长的阔绰生活，他要的住宅得带个绿树成荫、流水潺潺的精

---

<sup>①</sup> 堂娜玛丽娅一世(1734—1816)，葡萄牙女王。

美花园，而葵花大院却只是房后有一个荒凉的小庭院，那里野草丛生，只有一棵柏树和一棵南洋杉，蓄水池里堆满了垃圾，院内的小瀑布已滴水皆无；院内的一角，一尊大理石雕像（大使阁下一眼就认出了是维纳斯女神）由于丛生的草木和潮气的侵蚀，已逐渐变黑。此外，大使觉得马亚家的总管——老威拉萨对房租有点儿漫天要价，太过分了。他微笑着问道，是否总管认为教会还象莱昂十世<sup>①</sup>时那样阔绰。威拉萨回答说，如今的贵族也不比堂若昂五世<sup>②</sup>那会儿景气了。就这样，葵花大院依然无人居住。

这所没用的破房子——这是小威拉萨的叫法，他爹死后，如今他当上了马亚家的总管——直到一八七〇年底才派上用场，因为马亚家在本菲卡的那座古老的小宫殿式住宅，经过多年推销，这时刚脱手，卖给了一个巴西的爵爷，那里的家具和瓷器就搬到了葵花大院贮藏。这期间，马亚家的另一处住宅金雀花大院也卖掉了。在里斯本，对马亚家还留有印象，并且知道光复<sup>③</sup>以后这家人就在杜罗河<sup>④</sup>畔圣奥拉维拉庄园隐居的人，已寥寥无几，他们之中就有人问过威拉萨，是否这家人的日子变得艰难了。

“还有块面包吃呢，”威拉萨笑着回答，“而且还能抹得起黄油。”

马亚家是贝拉地区<sup>⑤</sup>一个历史悠久的家族，人丁一向不大兴旺，是独苗相传，没有亲戚。眼下就剩下两个男人：家主阿丰

---

① 莱昂十世，1475至1521年任教皇。

② 堂若昂五世（1689—1750），葡萄牙第二十四任国王。

③ 指1640年葡萄牙从西班牙六十年（1580—1640）的统治下重新获得独立。

④ 流经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一条大河，位于葡萄牙北部。

⑤ 贝拉地区，指葡萄牙旧行政区划的杜罗河和蒙得古河之间的地区。

苏·达·马亚，已老态龙钟，简直是位老祖宗了，出生在上个世纪；还有他那在科英布拉<sup>①</sup>学医的小孙子卡洛斯。阿丰苏最后到圣奥拉维亚隐居时，家庭收入已经超过了五万克鲁扎多<sup>②</sup>。打从那时起至今，又有了二十年农田收入的积蓄。后来，又得到了本族最后一位亲属塞巴斯蒂恩·达·马亚的一笔遗产——那人从一八三〇年就侨居那不勒斯，做古钱币生意。难怪这位总管谈到马亚家和说到他们还有面包吃时要带着那种自信的微笑了。

出售金雀花大院确实是威拉萨的主意，但是他不赞成阿丰苏仅仅因为本菲卡那幢房子的院墙目睹过这家人的重重不幸就处理掉它。照威拉萨的说法，凡是院墙，对那类事情都司空见惯。这样，马亚家现在在里斯本就没有一处住宅了，因为葵花大院无法住人。阿丰苏那么大年纪，固然喜欢圣奥拉维亚的宁静，可他的孙子是个有趣味的过惯了奢侈生活的年轻人，度假总爱跑到巴黎和伦敦。他毕了业是不会到杜罗河畔的山石堆中找归宿的。果然，在他离开科英布拉前的几个月，阿丰苏就宣布，他已决定搬到葵花大院去住。这可真使威拉萨大吃一惊！于是，这位总管罗列了一连串的理由，说这地方是如何不合用，其中最主要的是要花一大笔钱进行修缮；再说，连个花园都没有，对于在绿树成荫的圣奥拉维亚过惯的人来说，很是不方便。末了，他甚至连葵花大院的院墙对马亚家不吉利的传说都搬了出来。他还小心翼翼地加了句：“尽管在伏尔泰<sup>③</sup>、吉佐<sup>④</sup>和其他

---

① 葡萄牙城市，著名的大学城。

② 葡萄牙一种古币。

③ 伏尔泰(1694—1778)，法国著名诗人，作家。

④ 吉佐(1787—1874)，法国资产阶级右翼代表人物。七月王朝时历任内政部长、国民教育部长、外长、总理等职。1848年二月革命爆发被迫去职。

一些自由派哲学家生活的这个世纪，讲这种荒谬的话，连我自己也感到难为情……”

阿丰苏听了这席话捧腹大笑，并且回答说，这些理由好极了，不过，他还是希望住在自己的屋檐下。如果需要修缮，就好好修理一番，不管花多少钱，至于那些传说和不吉利的预言，只消敞开窗户，让阳光进来就平安无事了。

既然他老人家下了命令，加上这个冬天雨水不多，修缮工程立即开始。承包人叫埃斯特维斯，是位建筑师兼政治家，威拉萨的义父。这个建筑师设计了一个壮观的台阶，两旁各有一尊塑像，象征着对几内亚和印度的征服，这引起了总管的兴趣。他还正打算为餐厅设计一个陶瓷的小瀑布，就在这时，卡洛斯突然回到里斯本，同来的还有一位伦敦的装饰建筑师。同这位英国人匆匆忙忙研究了一些装饰和家具罩布的色调之后，卡洛斯就把葵花大院的四面墙壁都交给了他，让他按自己的喜好把室内布置得既舒适、豪华，又大方、雅致。

威拉萨因为本国的艺术家没受到尊重而感到痛心。埃斯特维斯也到他的政治俱乐部里大声疾呼这个国家完蛋了。阿丰苏也对解雇埃斯特维斯表示遗憾，坚持要把马车房的修建工作交给他。那位建筑师正准备接受时，却又被任命为民事长官了。

这一年，卡洛斯常来里斯本，为修缮出主意，“加点儿他的审美特色”。到了年底，古老的葵花大院就剩下那令人伤心的灰溜溜的门面没修了，因为阿丰苏不愿改变房子的正门，他说，这房子的特点全在于此。威拉萨也毫不犹豫地承认琼斯·布勒（他这样称呼那英国人）没花多少冤枉钱，利用了从本菲卡搬来的古董，就把葵花大院变成了一个“博物馆”。

尤其使人感到异样的是那个内院。那里过去杂乱无章，寸

草不长，碎石子铺路，现在变得绚丽多彩，地面铺上了一方方红白相间的大理石，加上花草盆栽和法国坎佩尔花盆的点缀，还摆了两条卡洛斯从西班牙弄来的古色古香的长凳，雕刻精美，色调庄重，象大教堂里唱诗班坐的排椅。从内院往上，在那个东方丝绒商店般的前厅里，听不见一点儿脚步声，厅内摆着蒙了波斯粗绒的长沙发和闪着金属光泽的摩尔人大铜盘，整个陈设色调庄重、协调，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一尊用洁白无瑕的大理石雕成的少女像，她正笑咪咪地把一只小脚伸向水中，又好象冷得在索索发抖。与前厅相接的是一条宽敞的走廊，陈列着从本菲卡搬来的几件最贵重的古玩：哥特式的拱门，印度的大花瓶，和几幅带宗教色彩的古画。葵花大院最讲究的几个厅都通到这个艺术品陈列走廊。主客厅很少用，这里是一式的秋天薜苔色的丝绒幔帐。厅内有一幅康斯特布尔<sup>①</sup>的杰作，那是阿丰苏的岳母鲁娜伯爵夫人的画像。她头戴一顶三角羽毛帽，身着英国狩猎女人穿的绯红色衣服，背景是漫天飞舞的雪花。旁边的一个小厅为音乐室，一派十八世纪的情调，屋内摆设着金色雕花家具，闪闪的印花丝绸，两块褪了色的法国著名哥贝林的银灰色挂毯遮住了四面墙壁，挂毯上的牧人和树木栩栩如生。

音乐室对面是台球室，室内铺了一块琼斯·布勒带来的时髦的皮革，上面，茂密的绿荫之中，银鹤展翅飞翔。隔壁一间是吸烟室，是葵花大院最舒适的一个厅：长沙发松软而宽大，有一种温暖恬静的舒适感。

走廊的尽头是阿丰苏的书房，挂着红缎子，象一位教长古色古香的寝室。结实的黑檀木写字台，硬木雕花的矮书架，装帧华

---

<sup>①</sup> 康斯特布尔(1776—1837)，英国著名风景画家。